

1 读懂检讨对象的心思很重要

对贪官的悔过书，或者说检讨书，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分析出“四要素”：交代问题、剖析动机、反省告诫、提出诉求。有媒体还把官员悔过书梳理出六大类型：声泪俱下型、请罪求情型、引经据典型、表功型、忆苦型、避重就轻型。

但这个套路目前只适用于贪官忏悔，草民要写好检讨书，需要遵循另外一套格式。

一般来说，检讨书要分三步走：一是表态认错，二是分析错误原因，三是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。

第一步认错很关键，要有诚意，绝不能扭捏作态、心有不甘。诚意可不是空喊口号喊出来的，检讨者要读懂检讨审阅者的心思，透过现象，直抵本质。在这点上，某些明

星、网络大V的检讨书似乎比很多贪官的检讨书写得好。

去年4月，薛蛮子因涉嫌聚众淫乱和寻衅滋事罪被抓。检讨书里，薛蛮子准确地把重点放在了网络造谣（也就是所谓寻衅滋事）上：“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，同时也给其他大V敲响了警钟：哪些事是能做的，什么样的微博是可以转发的，什么样的是不能转发的，要有一个严格的是非概念。”

相反，“嫖娼和聚众淫乱”的有关内容只是在检讨书的后半部分提了两句。老薛的检讨如此恰当地呼应了打击网络谣言的大形势，不知是他自己悔悟得道，还是有懂行者在深墙大院里帮助其打磨稿件。

再说大家熟悉的演员文章的道歉信，当

年的“周一见”事件中，文章的道歉信和马伊琍的“且行且珍惜”被赞为高水平的危机公关，如果不是因为道歉书中出现了简、繁两种字体，文章道歉的态度已经足够诚恳。

文章道歉信第二句就是：“演艺事业的平顺，造就了我狂妄自大、骄傲蛮横的脾气，导致今日岌岌可危的地步，我今天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”这句话挺妙，如果道歉是给妻女看的，何来“狂妄自大、骄傲蛮横”一说？如果一个男人不想离婚，大概不会在搞婚外情的同时，对家里的妻子表现得狂妄、蛮横。可见，道歉虽是因婚外情而起，却不是给马伊琍听的，而是说给媒体听的。

果然，最后负责审阅道歉信的媒体们放了文章一马，让他过关。

中国式检讨“三部曲”



北京犯罪嫌疑人薛必群（网名薛蛮子）

近两年，以薛蛮子为代表的公众人物犯罪后，大多上了中央电视台检讨、悔罪。（资料片）

近日，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新栏目“忏悔与剖析”，刊载官员悔过书，用“沉重的忏悔”引发“深刻的警醒”。

如果说西方国家因为宗教关系，将“忏悔”引入生活中，以求灵魂的安宁，那中国式“忏悔”则以另一种面貌出现——检讨。从贪官到各路网络大V、娱乐明星，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，都有机会接触这一特殊公文，如果你愿意玩味，可以看到其中有趣的共性，嗅到它们共生的土壤气息。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2 你得明白 你要向谁检讨

虽然说中国的检讨和西方的忏悔很相似，但有一点请务必搞清楚，那就是它们面对的检讨对象完全是两码事。

宗教世界里，人们忏悔面对的是神灵，而中国检讨面对的是和自己有关系的组织、个人，通常情况下还是上级、管理者。学生的检讨对象一般是老师，职员的检讨对象一般是单位领导，贪官的检讨对象是纪委或者法律执行机构。

检讨是否真诚，以是否符合检讨对象的心思为准，并不以让自己获得心灵宁静为准。

说回文章，婚外情虽是私事，但他很清楚公开的检讨书并非针对老婆，而是媒体。要展现诚意，就要把媒体最在意的敏感部分拿出来：我承认我之前大目中无人了，你们让我尝到厉害了，I服了YOU，放过我吧。

贪官同样很清楚他们的检讨对象是谁。

时事评论员刘洪波举了文强的例子。在悔罪书里，文强怪自己仕途不顺，多年没能升官。他写道：“看到比自己资历浅、业务不熟悉，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，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别的职务，甚至更高的职务，升官不成，就乱用权……”

还有贪官说“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”，有的说“自己多年来辛勤工作，过得仍是清贫生活……我心理不平衡了”，有的说“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，贪图享受、金钱至上等内容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”，有的怪行贿者技巧太高让人防不胜防，有的说自己不知受贿是犯法，有的说“大家都在拿，我随了大流”。

刘洪波说，贪官们的检讨书本质是恳求组织的原谅。贪官们都曾受组织重用，一部分人无形中把自己当成受宠的孩子，一遭犯了罪被组织处理，还放不下孩子的脾气，要撒一回娇：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，为什么不给钱更多些……

撒娇的极致，体现在一个传统故事中：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被处死，在刑场上请求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，他怪母亲对他没有从小严格教育，于是咬掉了她的奶头。

你可能看不惯这样的避重就轻，受不了那些雷同的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，认为他们写得不痛不痒，不过瘾。那就对了，因为这样的检讨书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的。

检讨书小史

从“罪己诏”到“文革”检讨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“检讨”一词古已有之，古代的检讨书可追溯至皇帝的“罪己诏”。不过，不同于现在的检讨，“罪己诏”来自“天子”，检讨对象是“天”，意在做个姿态，并不要求上行下效。

现代意义上的检讨源头不远，就在70多年前的延安。整风运动期间，毛泽东提出“治病救人”的口号，检讨开始兴起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“思想改造运动”中，检讨规模逐渐扩大。上世纪六十年代“四清”运动展开，继知识分子之后，全国大量参加过“土改”、“合作化”和“人民公社”等运动的农村基层干部也检讨起来。及至文革，检讨全面波及社会各个阶层。在“四清”、“文革”等检讨极

3 “迫不得已”是自我辩护的惯用思路

表态认错完了，那就该来第二步——分析主观原因。但第二步能否做好，绝对是个技术活。分析原因一般要分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。客观原因要讲足、找好，有技巧地自我辩护，但又绝不能让检讨审阅者产生检讨者有推卸责任的嫌疑。

如在赖昌星走私案中，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检讨，就充分利用了赖昌星做挡箭牌。“我接受过许多教育，读了不少书，却败在大字不识几个、靠走私起家的赖昌星手下”，再辅以赖昌星腐蚀、拉拢他的诸多细节，让检察人员看到自己如何被动地犯了错。

这种“好孩子被带坏”的思路在贪官检讨书中很有市场。2014年4月被双规的湖北某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某在检讨书中说：“我身边的开发

商、建筑商，天天在琢磨、研究我，看我有什么嗜好，爱搞什么活动，喜欢听什么话，于是我被吹捧得晕晕乎乎。”一句“天天在琢磨我”，就把自己从贪欲熏心的主动角色塑造成可怜的被动角色。

塑造“迫不得已”不仅是贪官检讨的必备思路，也是普通人做检讨时的好用手段。一个职员可以在自己上班迟到的检讨书里沉痛分析：“我总是把个人的困难凌驾于公司规章制度上，置广大公司员工的集体利益于不顾，置公司领导的威信尊严于不顾；自我放纵、丢弃原则。”

一句话里，既通过“领导威信”等关键词来展示检讨的真诚，也通过“个人困难”暗中叫苦，表达自己绝非故意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，只是有困难，不得已。

4 既要过关，又不能说得自己太可恶

写主观原因其实也是自我辩护。一般来说，千万不能把自己写得太过可恶，而要写得可怜。要突出自己对制度、纪律、上级意图领悟力和理解力不足，或自我意志薄弱、能力不够，总之就是“我绝不是反对，但是能力跟不上啊”。要不然，你理解力和能力都棒棒，还偏偏犯错，你说你不是主观故意的，谁信啊？

比如去年，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被双规。他在悔过书中称：“担任副主任以来，为省属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，为企业发展办了一些好事，为国资监管开创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工作，现在已经五十七八岁，职务上难以有进步，就这样了。快到退休的年龄了，也该图点清闲，享点福了。”

这段话妙在既“坦白”了自己贪腐的主观心理动机，又把自己的功绩摆到上级面前。言外之意：领导，我也是功臣，曾立下汗马功劳，就是快退休的时候一时糊涂了。

薛蛮子的检讨书当然也少不了主观原因。对于

一些食品安全事故谣言的传播，老薛抓住了一个词“虚荣心”。虚荣心，人人都有，谈不上有多少恶意。但薛蛮子又不讳言自己造成的恶果，“很严重的社会危害，给老百姓带来不安全感，让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受损。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，同时也触犯了刑法。”看似罗列一通，实际点到为止。

检讨书的第三步，就是要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。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：第一，表明自己改正的决心和态度；第二，对审阅者承诺日后的表现；第三，再次承认错误并感谢从轻发落。

再回到经典的薛蛮子检讨中来。在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上，身为美国公民的薛蛮子显示了强大的中国时代基因，此功力绝非那些“85后”“90后”的明星可比。“将来如果有机会，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，向社会传递正能量，也为净化网络环境做一些贡献，以此来弥补当初犯下的错误。”

当然，归根结底，中国式检讨的目的在于自省、警人。你要是总跟上述人一样检讨，多少花花心思都明摆着，蒙一人一时可以，久了，也就不灵了。

盛时期，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的邮局门口，那些代写书信的人都扩大了经营范围，明码标价，代写检讨。

在此期间，一些文人因为摆脱不了“臭老九”的惯性思维，写的检讨书也异彩纷呈，堪称经典。

有深入根源的，比如金岳霖的《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》，梁思成的《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》；有谈心得体会的，比如朱光潜的《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》，沈从文的《我的学习》；还有立誓型的，比如郭沫若的《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》，茅盾的《认真改造思想，坚决面向工农兵》等。这些检讨书，都在历史上留下或大或小的印记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人人检讨的时代也过去了。法律、规章、制度的价值被重新重视，“思想改造”一词渐行渐远。但在一些组织体系里，检讨并未完全烟消云散。